

中唐——北宋

文化建构文学史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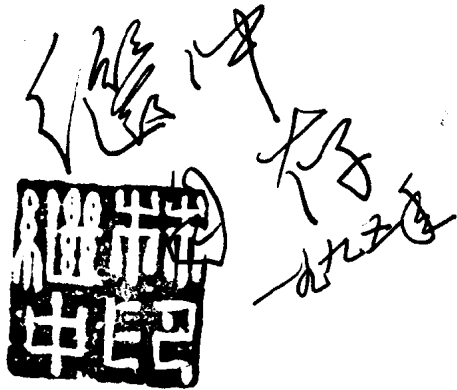
林继中 著



三秦出版社

中唐 —— 北宋
文化建构文学史纲

林继中 著



三 秦 出 版 社

(陕)新登字 06 号

文化建构文学史纲 (中唐—北宋)

林继中 著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12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艺华印装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7.875印张 140千字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版印刷

印数 1—500

ISBN 7-80546-823-0/I·203

定价: 15.00 元

序

陈伯海

继中同志《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一书终于问世了,我为他欢庆鼓舞。据我所知,他在这部书稿上确实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87年初,我们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初次相遇时,他对书稿已有了完整的构想。此后几年间,我们见面虽少,但通信里不时谈起这部稿子,从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我也了解到书稿的某些梗概。我曾答应为之推荐出版,始终没有成功。所以当继中同志告知即将梓行的消息,并嘱我写几句话,我也就打破历来怕给人作序的顾虑,勉力谈一点读后的感想。

坦率地说,对于“文化建构文学史”这个名称,乍听之下,我感到有几分生涩。好像还建议过继中同志换个书名,他没有听从,他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提法概括了他对文学史的基本认识。在他看来,任何时代的文学现象都不是孤立自足的,而是整个社会文化构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和总体文化构型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的关系。至于文化构型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处在逐步转型、不断

建构的过程之中；于是文学史就成了文化建构的一个方面，它受建构过程中的整合作用所驱动，而又以自身的变革参与了文化的建构。这样一种双向同构的运动，便名之曰“文化建构文学史”。

依据这个观点，书稿着重论述了中唐至北宋这一段文学的历史发展，作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构型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即由士族地主文化构型向世俗地主文化构型的过渡。全书从剖析唐中叶以后土地制度的变革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入手，具体论证了这一变化如何促进科举制度的沿革和政教一体化的趋向，并由前者带动世俗地主的知识化和文学由雅入俗再化俗为雅的回旋，更由后者造成儒学的复兴和伦理入主文学的局面，而两方面的演进则都归结为文学创作中新规范、新图式的构成。就这样，继中同志用他独特的文学史观理清了这一段文学演变的线索，又通过文学历史轨迹的综合考察生动地演示了他的文学史观。

当然，对于书中的论断会有不同意见，甚至它所表达的基本观念也可能引起商榷，但我相信，认真读过这本书的人，是能够从思想方法上得到某种启示的。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著述形成了固定的格套，即首先叙述一下社会背景和文学概况，然后就一个个作家分别作介绍。前面的背景教材由于是总括性的，往往不贴切具体的文学现象；而后面的作家介绍又多拘囿于个别状况，容易游离出社会历史潮流之外。这样一来，前

后两部分的配置，就好比在一个大镜框里嵌进了一幅幅小照片，镜框做得再精致，也只是照片的外表装饰，不能赋予其内在的生命。于是我们所见到的文学发展图景，便被割裂为零散的板块，不复构成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着的活生生的整体，这应该说是文学史景观上的一大缺陷。

本书的特点正在于超越了单纯从事作家述评的界限，而把中唐以至北宋的文学运行作为一个流程，更将文学史的运动纳入总体文化建构的框架内加以审视，找出其外部和内部的动因，进而把握住它随同文化建构的步伐一起波动震颤的脉息，这就使各种分散的文学现象得以串连、组合起来，而文学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子间的交互作用也才能充分揭示。试看书中所用由雅入俗再化俗为雅的回旋来归纳唐宋文学风气的嬗递，以及从政教一体化的要求推导出士大夫人格机制与文学倾向的转变，特别是末章所展示的在宋人期待视野作用下，杜甫被选择为诗歌典范及其由“诗史”到“诗圣”以至最终蜕化为内观照的“山谷模式”的过程，更是写得丝丝入扣，令人拍案叫绝。这除了归功作者学植深厚外，其得力于识见的超卓是无庸置疑的。

众所周知，史家传统有史学、史才、史识之说，而史识尤为难能可贵。中国历史之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相标榜，说的就是史识。后来的正统史家大多欠缺司马迁

的识力，所著史书不免下《史记》一等。这个道理对于文学史研究也应该是合适的。遗憾的是，古典文学领域多年养成的习惯是重史料而轻观念，甚至有以理论探讨为空疏无学的偏见，这不能不影响到文学史的著述，往往满足于杂陈事象、毛举细部，难以从大处着眼，把握其内在贯通的精神血脉，而太史公的期望也便落了空。近年来，人们对于这方面的缺陷开始有了认识。关于文学史观的讨论中，鲜明地提出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和主体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主张用今人的历史观念去烛照过去的历史，使死去的历史重新获得活力，成为当前理论建设的有用材料。我以为，在尊重历史客观性的前提下来看待这一要求，是无可非议的。与此同时，我们确也见到若干种有识见、有理论的文学史著作（多属断代史），能够透过对现象的缜密分析，逐步显示出其深藏的规律性，读来赏心惬意，本书即其中之一。这类著述并不匮乏史学、史才，而突出的优点则在于史识。尽管史识的发展完备有待于艰苦的锤炼，但努力用宏通的识力来熔铸史料，驱遣史笔，将历史研究提升到理论概括的层面上来，仍然是建设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文学史的必备条件。这一点我是确信不疑的，愿与继中同志共勉！

1992年10月于上海

自序

这本小册子自 1993 年 5 月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在此期间，笔者根据读者的意见，作了适当修订，征得海峡文艺出版社同意，交由三秦出版社重新出版。同时，笔者收到海内外一些师友的函件，除勉励之外，大多希望笔者能尽快写出“通史”。以笔者弩下之才力，自知此梦难圆，但假以时日，写完魏晋至盛唐部分是完全可以的。我想，将它与出版的部分合订起来，读者对文化建构中的文学变迁也许会有个较完整明晰的印象，“文化建构文学史”这个提法便不再是那么令人“眼中生涩”了，此是后话。

眼下，“重编文学史”已由呼吁进入实战的阶段，数以十计的断代或专题文学史纷纷“揭竿而起”，为来日一代新史的出现摧陷廓清，提供了许多实践经验。其中，“新知”与“旧学”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颇引人关注。在师友来函以及报刊评论中，不少同仁提及拙作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借此机会，愿一陈管见，也算是给关怀我者的一个公开答复。

I. 我们坚持唯物史观，但唯物史观必须在新科技条件下求自身的发展。恩格斯认为，上世纪自然科学主

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而本世纪的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我们已经过渡到系统地研究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时代。^①从恩格斯身后至今，人类又经历了一个科学技术发生突进的时代。单就自然科学的理论而言，就有“旧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与“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先后产生，照耀着今日的世界。显然，科技的巨大进步为唯物论发展开拓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唯物史观在新科技的条件下，也同样有其自身必然的发展。我认为，当前社会科学工作者将自然科学的成果引进社科研究领域是无可非议的，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甚或因噎废食。就唯物史观而言，我们要相信：它有巨大的兼容性与消化能力。

“时下”，有不少学人将系统论引入社科研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或者失败。只要是认真的，而不是故弄玄虚的尝试，我认为无论成功与失败，都应得到鼓励。就以系统论为例，系统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可以成为互涵的关系而非对立的关系。系统论强调整体，特别是强调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这种思维方式与我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相当接近。中国哲学讲究“天人合一”、“万物与我为一”，将人与整个世界视为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242页。

个整体；中国美学讲究“和谐”、“和而不同”；中国医学讲究人体的整体性与协调等等。诚如普利高津所说：“中国文化具有一种远非消极的整体和谐。这种整体和谐是由各种对抗过程间的复杂平衡造成的。”^①应当说，它与注重从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中去把握整体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方向是一致的。恩格斯对把握系统整体有过论述。他说：

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②

他甚至将19世纪的自然科学概括为：“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科学的进步要求研究者注重“一个大的整体”中各因素之间与整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更是如此，各种概念与方法在长期隔离之后突然遭遇在一起，相互冲击，相互融合，发生了巨大的进展。在历史研究领域，将中西方文明，甚至全人类文明做为“一个大的整体”来研究，已成为时尚。如

① 尼科里斯、普利高津《探索复杂性》中文版序言。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

《历史研究》的作者汤因比，就将人类文明划分为二十多个“充分发展的文明”，并宣称只有在整个文明水平上，民族历史事件才真正成为可理解的。其著作正是从事世界各种文明的广泛的比较研究。而《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的作者雅斯 贝斯则提出著名的“轴心期理论”。他将公元前 800—200 年的人类历史称为“轴心期”。众多哲学家在中国、印度、西方三个地区几乎同时出现，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印度的佛陀，伊朗的祆教，巴勒斯坦的先知，希腊的荷马、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雅斯贝斯是在人类的一致性中研究多样性与不平衡，追踪历史的统一。《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韦伯，又以其独特的历史比较的方法，对东西方主要国家的几千年文明史进行了较全面的比较，特别是将资本主义作为历史产物，研究了它在人类历史舞台上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运动轨迹，从而预测资本主义文明将向何处去。这些不同学派之处，就在于将人类做为“一个大的整体”，来研究其间的各种联系与相互的作用。应当说，这是本世纪科技发展对历史学的有力影响的反映。这些学者提出的“轴心期理论”、“挑战—应战”理论、“资本主义精神”等等，都很有启发性。只要我们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放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有着“原始起因”与“最终决定作用”的影响这一基本原则，我们就有可能改造这些虽属于唯心史观却又是很机智的研究方法，使之倒转回来，以脚立地。马克思、

恩格斯对黑格尔巨大的唯心主义体系的成功改造，仍然是我们的典范。马克思有一段话颇值得回味。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

我想，这段话至少有两层意思值得细细品味：一是唯心主义并非一堆垃圾，在“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它有长处。近年来，西方新学派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其中不乏“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的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文化人类学各流派，对人与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做了不少“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的有益的探索，成果颇丰。无视这些成果，一切从零开始，我们就很难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再一层意思是，可见唯心主义的东西并不像烂苹果，剝去烂的就剩下好的。即使是“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的东西，也“只是抽象地发展了”，我们还要对它下改造的功夫，使之倒转来以脚立地，这才能为我所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对文学史研究来说，人的实践活动同样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弗洛伊德的东西，结构主义的东西，马斯洛的东西，统统要改造为对人的感性活动的理解，其中“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的东西才能为我所用。让这些“花”结出“果”来，这也是唯物史观的“指南”作用。

Ⅰ. 唯物史观有必要对传统治学方法进行整合。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中华民族这样，具有这么长的完整而且连续的文字历史。黑格尔对这笔文化遗产嗤之以鼻，认为“这部历史，在大部分上还是非历史的，因为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因为在一切不息的变化中，还没有任何的进展。”^①这恐怕不仅仅是对中国历史研究不深的黑格尔个人的意见。即使是今日，当我们提起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时，许多人也不是将它理解为在重复中隐藏着某种新的适应与弹性，是新与旧之间的妥协，是走两步退一步；而是将它理解为“鬼打墙”式的原地转悠，是不断的复原，走一步退一步。“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王朝的迭起，“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又加强了这一印象。梁启超概括传统治史方法时曾说：

大抵自宋以后所谓史家——除司马光、郑樵、袁枢有别裁特识外，率归于三派。其一派则如胡安国、欧阳修之徒，务为简单奥隐之文词，行其溪刻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51页。

隘激之‘褒贬’。其一派则苏洵、苏轼父子之徒，效纵横家言，任意雌黄史迹，以为贴括之用。又其一派则如罗泌之徒之述古，李焘之徒之说今，唯侈诂博，不复审择事实。^①

将注意力集中于褒贬，搞影射，罗列史实逞博，的确是传统治史的手段，但并不尽如此。司马迁讲“通古今之变”，管仲讲“仓廩实则知礼义，衣食足则知荣辱”，王夫之讲“理势合一”，都接触到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②各种“正史”之注重沿革，写下许多综合性质的《志》，清人则有许多有关典章制度沿革的专考及史论，这些都留下先人探索历史规律的足迹。而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书名到内容以及编年体形式，更是表明了先人要理出一条历史前行的经验轨迹的大决心。尤可宝贵的是，传统治史已形成一种要求“直笔”的规范，讲究经世致用。发展至清代，诚如梁启超所指出的：

“总而论之，清儒所高唱之‘实事求是’主义，比较的尚能应用于史学界，虽其所谓‘实事’者，或毛举细故，无足重轻，此则视乎各人才识何如。^③”古人的“实事求是”，重在考证（乾嘉学风尤其如

①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8页。

② 参看张岱年《文化与哲学》，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30—232页。

③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09页。

此)，于规律之“是”尚未倾其全力，不等于今日所倡之“实事求是”，但二者的求实精神有某种相通之处则颇为明显。如潘次耕序潘力田《国史考异》：“去取出入，皆有明征，不徇单辞，不造臆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梁启超曾概括清代正统派学风的特色：其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其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其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①这种求实的学风，至今仍应提倡。顺便提一下，目前不少人主张引例证要少而又少，或将要引的原文用自己的话说出就行，我认为尚可商榷。堆积、罗列材料固然不必要，但多些不同角度的例证，对论证是很有必要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笔遗产对文史工作者来说，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现存史料文献有大量可信的资料，不容忽视。与之相应的是传统治学的校勘考订文献史料所载事实的手段，尤应继承。需知用虚假不实材料，是构筑不了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固然历史是一个过程，但“必然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整理材料，发现规律，搜集材料，去伪存真，是先决条件。

^①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9页。

其二，古人的“实事”尚停留于“唯侈浩博”、“毛举细故”，而清人的“考据癖”更是以手段为目的，于“求是”尚未会心。唯物史观将赋予“求是”以新的生命力。如果说传统治学尚在“一治一乱”中兜圈，那么唯物史观可使之跳出圈外。用唯物史观为指南，可融合传统的治史方法，使其中合理成分消融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南的新方法中，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那古老的文献，跳出王朝更迭、周而复始的圈子，在“超稳定”的表象下揭示其不稳定的律动。

笔者还是这个观点：文学史问题，首先是个史观问题。但愿以上的陈述有助于读者对本书的审视。亟盼读者诸君不吝赐教，这对笔者下一步工作必定大有裨益。

最后，让我衷心感谢林正让、赵克明、韩理洲诸同志。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恐怕出不了。

林继中 1994年6月于漳州

目 录

导言	(1)
一、嬗变中的文化构型	(9)
1. 1 士庶混一与政教分离	(9)
两种文化构型的交接处——诸课更订——两税法	
——“牛李党争”——历史的课题。	
1. 2 科举：文化建构的杠杆	(22)
“唐以诗取士”——儒学与皇权的联姻——学校、科举、	
文化——世俗地主知识化及其效应。	
二、世俗地主知识化运动中的文学	(37)
2. 1 由雅入俗的新浪潮	(37)
浅切俗艳与尚怪——“光阴听话移”——重感官的彩绘	
笔触——“诗余”——“凡有井水饮处皆歌柳词”。	
2. 2 化俗为雅的回旋运动	(66)
西崑体：第一次雅化运动——“跳出坑底又掉进井里”	
——绚烂归于平淡——词的“本色”。	
三、反思转入内省过程中的文学	(93)
3. 1 一体化及其个体规范化的要求	(93)
儒学转向与文化目的——古文运动的实质——文章务	
本论——宋人眼中的唐人——伦理入主文学。	